

白下古蹟文獻選錄

卷之二

十三年刊

南京博物院藏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四册

(一九二八)

中央档案馆编

党内文献·注意保管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慈中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四册

(一九二八)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 30.5印张 350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3230·129 印数 1—50000册

(党内发行)

编 辑 说 明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是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由中央档案馆选编的一部党的历史文献。本文集选编了一九二一年以来的中央文件和中央负责人的报告、文章，以及反映党的方针政策的党报社论。

本文集选编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文章，凡已编入《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的，只列目录，不再刊印文字。刘少奇、朱德的已公开发行的文章，也用同样办法。

本文集选编的文献，均照原件刊印。错字改正和漏字增补加“〔 〕”号，无法辨认的字代以“□”。需要说明的地方，由编者加注说明。

本文集分册出版，内部发行，由县级以上档案部门保管，供党内县级以上干部和党史教学研究人员查阅，不准翻印。

在选编工作中，虽经反复校订，错误仍然难免，请读者发现问题随时告诉我们，以便改正。

一九八一年九月

目 录

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	
——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	1
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	10
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	
——关于组织工作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13
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	
（一九二八年一月）	2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42
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	
——关于政治局势与斗争策略的决定	
（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	49
附：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附文	
（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	51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	
——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	66

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	73
中央通告第三十九号	
——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日)	80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	
(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	85
中国共产党反对日兵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	
(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	88
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	
——“五三”惨案后反帝斗争工作	
(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	94
中央通告第四十六号	
——关于对第三党的认识和态度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一日)	99
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	
——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	102
中央通告第四十八号	
——“五三”以来的形势与深入反帝斗争问题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	109
中央通告第五十号	
——关于职工运动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115

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	
——军事工作大纲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119
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	132
中央通告第五十二号	
——张作霖退出北京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和策略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	147
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	
——国民党军阀打下平津后的形势和深入反帝运动复兴城市工作问题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154
中共中央为国民党军阀攻下京津告全国工农兵及劳苦民众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162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一九二八年七月)	167
政治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167
土地问题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191
农民问题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208
职工运动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217
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233
关于党纲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234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234
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235
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235

宣传工作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251
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258
妇女运动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263
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271
附一：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	272
附二：中国共产党组织决议案草案	287
关于大会宣言问题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296
中国共产党党章(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通过)	296
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	308
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	
——兵运策略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316
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	
——关于反帝工作的指示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	324
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330
中央通告第六十一号	
——目前政治情形和我们的责任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349
中共中央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367
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	
——目前党的根本策略与政治宣传鼓动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	374

中央通告第六十三号	
——秋收工作方针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	379
中央通告第二号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	386
中央通告第三号	
——目前革命形势与党的战术和策略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	393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	405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中央通告第六十九号	
——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	412
中央通告第八号	
——总的政治路线之正确的运用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	425
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五日)	430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	
——目前政治形势与群众工作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	436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441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

——职工运动问题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454

中央通告第二十号

——反帝国主义与争取群众策略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457

中央通告第二十三号

——青年工人运动的意义与目前工作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473

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

——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

一、中央自从叶贺失败之后，便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上确定中国革命是有直接革命的形势。这种直接革命的形势表现于：（一）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和北方军阀的统治动摇而不能稳定，他们内部的纠纷冲突和混战日益发展；（二）民众革命的势力仍在日益生长，——各省农村之中尤其有不断的自发的农民骚动；（三）各省的工商农业金融交通在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下不断的紊乱崩溃，形成全国经济的总危机，客观上工农贫民兵士的群众，只有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出路。

二、最近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暴动，事实上更加证明了中央这种观察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同时，广州暴动更证明了中央扩大会议及中央常委历次对于各地党部的指示，尤其是关于暴动问题必须发动群众之指示，是异常之重要的。广州暴动的胜利，主要是能发动群众，造成工农兵三大力量之结合；他的失败，主要的也是发动群众之尚不充分。

三、中央扩大会议的总策略是：（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性；（二）努力使相互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变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广州暴动便是这种策略运用的尝试：海陆丰农民暴动的胜利与组织力量的表现，其他各县及广州市郊农民发动的尝试，以及广州斗争的发动与农民兵士暴动的联络。固然，广

州暴动之中还有许多策略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的政治意义是不可磨灭的。他在策略上证实中央政策的正确。

四、广州暴动虽然失败，而中国直接革命的形势更加的明显，武装暴动的问题更加成了实际的问题。所以对于武装暴动的政策尤其应当有明确观念。根据过去的经验，各地党部在指导暴动或规划暴动的时候，有许多错误的观念，例如：

(一)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因为不信任群众力量的缘故，而偏于军事投机主义，这就是只规划军事的力量，计划着如何调动某某部队，某某农军，某某工农讨逆军，勾结某某土匪首领的部队，组织几队几队的游击队，如此用阴谋式的计划发动“暴动”。这种所谓暴动完全与群众无关。例如湖南去年秋收暴动之中，北方玉田暴动之中，江苏去年十一月宜兴无锡暴动之中江西鄱阳星子暴动之中，都只见军事力量的发动。尤其是去年鄂北暴动的规划之中，居然有联络农^①所反对的樊钟秀之计划，而没有发动和领导群众起来斗争而达到武装暴动之计划。

因为不信任群众力量的缘故，而采取等待政策，这就是不相信农民群众的斗争和兵士群众的运动，可以从部分的斗争发展成总的革命高潮，可以从极了^②的武装力量，创造出群众的武装力量，因此只在幻想着全省定期的总暴动时，如何一致的同时同刻的发动，或者先先后后用巧妙的战术步骤来逐地发动；于是采取等待政策，对于各地群众当时自发的斗争，反而不去领导。例如广州秋收暴动时等待叶贺，河南雒山四方山已有农民自发的斗争而不去领导，尽在等待全省总暴动之时期。

因为不信任群众力量的缘故，甚至已经有了很大的群众起来暴动，

①② 原文如此。

到了最吃紧的时机，仍旧临阵脱逃。这就是在暴动起来之后，一切规划仍旧完全建筑在军事力量的估计上，不去发动更广大的群众，不去领导群众向前进攻，而只根据于兵力不足的理由，骤然制止群众的前进，骤然去解散群众的队伍。如鄂南秋暴期间进攻蒲圻咸宁的停止，湖南秋暴期间暴动势力已从浏醴发展到株州，而长沙九月十三日的暴动期却宣告无期延期。

凡是这种军事投机，等待政策和临阵脱逃，都是根源于不信任群众的力量。这些倾向的背景，便是想象在群众之外另外有一种力量——军事的力量，可以同〔用〕阴谋政变的方法，推翻反动政治而替群众来立一个好政府。所以始终不和群众的斗争联结起来，使党成为群众斗争的指导者，却只是这种军事力量的指导者，一切进退攻守联甲攻乙的计划完全以这种群众以外的力量为标准。

(二)不顾群众力量——因为不顾到群众的力量，所以也是不去组织和发动群众，不去领导群众目前的斗争以求创造暴动的局面，而只是主观上认为“不暴动即是机会主义”，无往而不暴动，天天可以马上暴动，时时可以马上暴动，甚至于一次罢工，打杀一两个工贼，亦都称之谓暴动，于是又成为“无动不暴”的倾向。湖北党及C·Y·一部分同志在十月底主张马上暴动；山东省委对于淄博矿工罢工的指导也称暴动等类，都是这种实例。

因为顾不到群众的力量，所以在群众斗争并未发动到大规模的革命高潮，不但党的群众尚未普遍的自觉的要求夺取政权，甚至党内自身的组织力量和领导力量都很薄弱的时候立刻便号召“暴动已经实实在在的到来了”，立刻便发出“大暴动”命令。这就形成玩弄暴动的倾向。北方局在实际上只是勾结热河土匪，北京城内只有一千多学生同志，唐山天津都未能切实发动工人群众的斗争（天津党的组织只有一百余

人)，那时便决定顺直的“大暴动”；江苏省委，在去年十一月间上海杨树浦纱厂罢工之扩大尚须少数工人持硬打方能成功的时候，却在号召全上海说“暴动实实在在已经到来”，便是这种实例。

凡是这种“无动不暴”“玩弄暴动”的倾向，其根源都在不顾群众的力量，就是不去指〔扎〕实的准备群众，组织群众，不在日常斗争之中去步步引导群众从部分的切身的要求，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要求。这种倾向的背景，其实也是不认识群众的力量，也是无意之中以为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之外，另外有一种英雄的力量，超过群众的超人的力量，脱离了广大的群众，可以“暴动的精神”代替暴动的本身。

(三)不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因为不认明本党的根本任务，是力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之实现，所以在工农自发的暴动潮流之中，以前本党大有忽略职工运动之倾向。甚至于江苏宜兴暴动的时候有些同志以为上海的工作应当以响应外县农民为政策。

五、凡是这些错误的倾向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及最近政治局会议对于广州暴动之意义及教训的议案，以及对于各地的指示都曾经指出，并加以纠正。现在则对于暴动政策之意义更加以确切的解释。

不信任群众力量的各种倾向之表现：军事投机，等待政策和临阵脱逃，固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然而不顾群众力量的倾向的表现：无动不暴和玩弄暴动，亦是机会主义之另一方式的发露。总策略之中说“要努力使零星的暴动尽可能的成为大范围的农民总暴动”，而不顾群众力量的无动不暴和玩弄暴动，恰好是使暴动成为零星散乱的。总策略之中说“要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和农民暴动相联络”，而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倾向，恰好是不去认真的准备并发动工人群众的力量，或者将城市工人的力量当做副力。

六、武装暴动政策的主要意义：

(一)中国各省农村之中，农民自发的暴动，如潮流似的生长起来，这些自发的农民暴动的根源，自然是农民所受的种种压迫：地主豪绅的政权，地租田税杂捐等等，重利盘剥，无往不是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问题，这些问题在群众之中时常可以引起激烈的斗争，虽然有时这些斗争事实上可以开始于比较温和的方式，如要求减租减税，甚至于请愿等等，但是很快的便急转直下到剧烈的斗争，杀死收捐收债……的人，引起群众的愤怒，激起群众的直接行动，而转入武装斗争——暴动。

党的任务正在于发动这些潜伏待发的斗争，或者引导这种自发的农民斗争到武装暴动，因此党在农村之中发展支部，建立秘密的农民团体等是党的经常任务，而发动极广大的群众斗争，并领导这种斗争尤其是中心问题。

(二)农村中群众斗争发动而进于武装暴动，则游击战争便成为武装斗争的一种最初的方式。游击战争只是农村中群众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的总过程中的一种斗争方式。暴动群众既然开始了武装斗争，则他们必须创造自己的武力；农民的武装队，他们开始袭击反革命的军队(民团团防等)，要采取游击的战术。这是说暴动的农民和反革命派作战的时候，不能采取正式军队的作战方式，而用少数武装力量袭击敌人，用“分散细小的队伍，使敌人防不胜防出其不意的去袭击”。这种游击战争，必须群众斗争中发动出来的，至少也必须是发动群众斗争的。他不能和群众斗争相离的。他仅仅是群众的农民斗争的一种武装斗争的方式，决不能认为游击战争便是农民暴动的全部，或者认为农民暴动就等于游击战争。

(三)农民暴动中游击战争的胜利，其目的当然在于创立革命的地域。农民群众斗争发动的时候，就要组织群众于农民代表会议(苏维

埃)，使苏维埃成为暴动的指导机关(这是此次中央扩大会议更进一步的规定)。暴动的胜利，例如游击战争的结果，能够使暴动的农民战胜反革命派于某一区域之后，那么，这地方农民代表会议便要变成革命政权的机关。这种革命区域的创立(或所谓农民割据)自然有发展其他区域的农民群众暴动的前途——以进而创立一省或几省的总暴动的局面。

(四)城市——无产阶级的中心区域，在这种农民暴动自发的汹涌潮流之中，自然应当成为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之总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这是扩大会议就肯定的指示出来的。城市工人的职工运动，因此成为更加千倍重要的动力。虽然城市工人除此次暴动前之广州外，其他地方的斗争，都还没有进于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高潮，但是广州暴动后，各地资本家的进攻更加厉害，反动政府更加公开的压迫一切工人运动，所谓停止一切民众运动。工人群众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要求真正群众工会的公开，反对白色的国民党假工会的斗争，要履行以前的罢工条件等等，这些要求，都是群众日常生活中所迫切的问题。

党的任务，便是努力在这些日常斗争之中，去发动群众，切实的准备群众，组织群众于革命的工会之中。从经济斗争领导到政治斗争，努力去建筑群众的基础，不但要发动汇合这些斗争到普遍的群众的愤激，转入总的政治斗争，反抗政府的总同盟罢工，而且要在日常生活斗争中逐步领导群众一般模糊的愤激与反抗，更进于坚决的夺取政权的要求。

中央扩大会议，所指示的城市暴动的条件：(1)工人群众的革命高潮——工人日常斗争的加紧与扩大，形成总的政治斗争；(2)治者阶级统治的动摇崩溃的形势；(3)一般商民的慌乱犹豫摇动，对于治